

中國新文學大系

胡 適

建設理論集



建設理論論集

胡適編選

總序

蔡元培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前 言

趙家璧

我國的新文學運動，自從民國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適陳獨秀等發動後，至今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時間，比起我國過去四千年的文化過程來，當然短促值不得一提，可是他對於未來中國文化史上的使命，正像歐洲的文藝復興一樣，是一切新的開始。牠所結的果實，也許及不上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般的豐盛美滿，可是這一羣先驅者們開闢荒蕪的精神，至今還可以當做我們年青人的模範，而他們所產生的一點珍貴的作品，更是新文化史上的至寶。

這二十年時間，大約可以分做兩個不同的時期：從民六（一九一七）的發難到民十六（一九二七）的北伐，從民十六的北伐一直到现在。前一時期的新文學，貫穿着「文學革命」的精神，到北伐成功，便變了一付面目。這後一時期的新文學，至今還在繼續發長中，我們既不能隨便替他作結束，為事實上便利計，就先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個十年間，關於新文學理論的發生，宣傳，爭執，以及小說，散文，詩，戲劇諸方面所嘗試得來的成績，替他整理，保存，評價。在國內一部分思想界頗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無意義的；而且供給十年百年後研究初期新文學運動史者一點系統的參考資料，也是我們所應盡的責任。

這一個新文學大系的計劃，得益於茅盾先生，阿英先生，鄭伯奇先生，施蟄存先生的指示者很多，沒有他們，這個計劃決不會這樣圓滿完備的。蔡元培先生，胡適先生，鄭振鐸先生，魯迅先生，周作人先生，朱自

清先生，郁達夫先生，洪深先生和上述的前三位，化費了他們寶貴的時間，替我們搜材料，編目錄，寫導言，使這十部大書得以如願的實現，我借了這個機會，敬向他們深深的致謝。

還有項德言先生，陳受頤先生，林語堂先生，甘乃光先生，葉聖陶先生，冰心女士，傅東華先生，沈從文先生，儲安平先生和其他許多友人，他們在各方面贊助我們；而國內許多重要的圖書館，更給予我們最大的便利，這更是我們所應當鄭重感謝的。

這部書的工作從去年年底開始，中間經過不少次的挫折，到今天才算功德圓滿了。我們相信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間許多英雄們打平天下的偉績，是值得有這樣一部書，替他們留一個紀念的。現在我們做成了，我們覺得了却了一件心願！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一日

總序

蔡元培

歐洲近代文化，都從復興時代演出；而這時代所復興的，爲希臘羅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認的。我國周季文化，可與希臘羅馬比擬，也經過一種煩瑣哲學時期，與歐洲中古時代相埒，非有一種復興運動，不能振發起衰；五四運動的新文學運動，就是復興的開始。

歐洲文化，不外乎科學與美術；自純粹的科學：理，化，地質，生物等等以外，實業的發達，社會的組織，無一不以科學爲基本，均得以廣義的科學包括他們。自狹義的美術：建築，雕刻，繪畫等等以外，如音樂，文學及一切精製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術包括他們。而近代的科學美術，實皆植基於復興時代；例如文西，米開蘭基羅與拉飛爾三人，固爲復興時代最大美術家，而文西同時爲科學家及工程師，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觀察與實驗法，哥白尼與加立里的天文學，均爲開先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與美術家，何以不說爲創造而說是復興？這因爲學術的種子，早已在希臘羅馬分布了。例如希臘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種柱廊，羅馬的穹門，斐諦亞，司科派，柏拉克希脫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畫與花瓶，荷馬的史詩，愛司凱拉，索福克，幼利披留與亞利司多芬的戲劇，固已極美術文學的能事，就是賽勒司，亞利司太克的天文，畢達可拉斯，歐几里得的數學，依洛陶德的地理，亞奇米得的物理，亞里斯多得的生物學，黑樸格拉底的醫學，亦都已確立近代科學的基

礎。

羅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舊文化幾乎消滅，這時候，保存文化的全恃兩種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勢力，局於一隅；而基督教的勢力，則幾乎彌漫全歐。基督教受了羅馬政治的影響，組織教會，設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羅馬為中心，駐以教皇。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文化，一切教會化，例如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得，自生物學而外，對於倫理學，美學及其他科學，均有所建樹，而教會即利用亞氏的學說為工具，曲解旁推，務合於教義的標準。有不合教義的，就指為邪教徒，用火刑懲罰他們。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剝奪，觀中古時代大學的課程，除聖經及亞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點名學，科學及羅馬法律，沒有歷史與文學，他的固陋可以想見了。那時候崇闊的建築，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參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願望，正與希臘人均衡和諧的建築，代表現世安和的命運相對待。附屬於建築的圖畫與雕刻，都以聖經中故事為題材；音樂詩歌，亦以應用於教會的為時宜。

及十三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語發表他最著名的長詩神曲，其內容雖尚襲天堂地獄的老套，而其所描寫的人物，都能顯出個性，不拘於教會的典型；文詞的優美，又深受希臘文學的影響而可以與他們匹敵，這是歐洲復興時期的開山。嗣後由文學而藝術，由文藝而及於科學，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種革新運動。

我國古代文化，以周代為最可徵信。周公的制禮作樂，不讓希臘的梭倫；東周季世，孔子的知行並重，循循善誘，正如蘇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陳王道，正如柏拉圖；荀子傳羣經，持禮法，為稷下祭酒，正如亞里

斯多德；老子的神祕，正如畢達哥拉斯；陰陽家以五行說明萬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風爲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亞派；莊子的樂觀，正如伊壁鳩魯派；名家的詭辯，正如哲人；縱橫家言，正如雄辯術。此外如周髀的數學，素問靈樞的醫學，考工記的工學，墨子的物理學，爾雅的生物學，亦已樹立科學的基礎。

在文學方面，周易的絜靜，禮經的謹嚴，老子的名貴，墨子的質素，孟子的條達，莊子的傲詭，鄒衍的闊大，荀卿與韓非的刻覈，左氏春秋的和雅，戰國策的博麗，可以見散文的盛況。風雅頌的詩，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辭賦，可以見韻文的盛況。

在藝術方面，樂記說音樂，理論甚精，但樂譜不傳。詩小雅斯干篇稱「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可以見現今宮殿式之棟桷，已於當時開始！當代建築，如周之明堂，七廟，三朝，九寢，楚之章華臺，燕之黃金臺，秦之阿房宮等，雖名制屢見記載，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臘羅馬的石材，故遺跡多被湮沒。玉器銅器的形式，變化甚多，但所見圖案，以雲雷文及獸頭爲多，植物已極希有，很少見有雕刻人物如希臘花瓶的。韓非子說畫犬馬難，畫鬼魅易，近乎寫實派，莊子說宋元君有解衣盤礴的畫史，近乎寫意派，但我們尙沒見到周代的壁畫。所以我們敢斷言的，是周代的哲學與文學，確可與希臘羅馬比擬。

秦始皇帝任李斯，專用法家言，焚書坑儒。漢初矯秦弊，又專尚黃老；文帝時儒家與道家爭，以「家人言」與「司空城旦書」互相詆。武帝時始用董仲舒對策（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策」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

元元年：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奏罷。」；詔「可」。武帝乃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利祿之途」既開，優秀分子，競出一途，爲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時至三千人；後漢時大學至二萬餘生，都抱着通經致用的目的，如「禹貢治河」，「三百篇諷諫」，「春秋斷獄」等等，這時候雖然有陰陽家的五德終始，讖緯學的符命，然終以經術爲中心。魏晉以後，雖然有佛教輸入，引起老莊的玄學，與處士的清談；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鍊，符籙的迷信；但是經學的領域還是很堅固，例如義疏之學，南方有崔靈恩，沈文阿，皇侃，戚袞，張譏，顧越，王元規等，北方有劉獻之，徐遵明，李鉉，沈重，熊安生等；（褚季野說：「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安國說：「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又說：「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觀月；南人看書，如牖中窺日。」）迄於唐代，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殞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經學的勢力，隨「利祿之途」而發展，真可以壓倒一切了。

漢代承荀卿，屈原的餘緒，有司馬相如，楊雄，班固，枚乘等競爲辭賦，句多駢麗；後來又漸多用於記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銘，就是這一類。魏晉以後，一切文辭均用此體；後世稱爲駢文，或稱四六。

唐德宗時，（西歷八世紀）韓愈始不滿意於六朝駢麗的文章，而以周季漢初論辯記事文爲模範，創所謂「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時候與他同調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對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廬，焚其書」的提議，乃與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補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當誅天王聖明」等語，以提倡君權的絕對。李翱等推波助瀾漸引起宋明理學的運動。但宋明理學，又並不似韓愈所期待的，彼等

表面雖亦排斥佛老，而裏面却頗兼採佛老二氏的長處；如河圖洛書、太極圖等，本諸道數；天理人慾明善復初等本諸佛教。在陸王一派，偏於「尊德性」固然不諱談禪，陽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話，與科學背馳，固無足異；程朱一派，力避近禪，然陽儒陰禪的地方很多。朱熹釋格物爲卽物窮理，且說：「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似稍近於現代科學家之歸納法，然以不從實驗上着手，所以也不能產生科學。那時程頤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斥再醮婦，蹂躪女權，正與韓愈的「臣罪當誅」相等，誤會三綱的舊說，破壞「五倫」的本義。不幸此等謬說適投明清兩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舉爲誘惑，一方面以文字獄爲鞭策，思想言論的自由，全被剝奪。

明清之間，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義，力闢以理責人的罪惡；俞正燮於癸巳類稿存稿中有反對尊男卑女的文辭，遠之合於諸子的哲學，近之合於西方的哲學，然皆如曇花一現，無人注意。

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始則感武器的不如人，後來看到政治上了，後來看到教育上，學術上都覺得不如人了，於是有維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爲號召，康有爲、譚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書、本禮運的大同義而附以近代人文主義的新義，譚氏有仁學，本佛教平等觀而衝決一切的網羅，在當時確爲佼佼者。然終以遷就時人思想的緣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結果仍歸於失敗。

嗣後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於是有辛亥革命，實行

「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幾達極點，保皇尊孔的舊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所卵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此暴力壓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是陳獨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於民國四年創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陳六義：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國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上道德上經濟上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愛的，互助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希望那虛偽的，保守的，消極的，束縛的，階級的，因襲的，醜的，惡的，戰爭的，軋轢不安的，懶惰而煩悶的，少數幸福的現象，漸漸減少，至於消滅。」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有云：「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國粹和舊文學。」他的主張民治主義

和科學精神，固然前後如一，而「破壞舊文學的罪案」與「反對舊文學」的聲明，均於八年始見，這是因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起於五年。五年十月胡適來書，稱「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僻俗字俗語；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摹倣古人，語語須有我在；八曰：須言之有物。」由是陳獨秀於六年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有云：「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爲我友胡適。余敢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這是那時候由思想革命而進於文學革命的歷史。

爲怎麼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爲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錢玄同於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陳獨秀書，有云：「舊文章的內容，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爲文中之荒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張的「廢滅漢文」雖不易實現，而先廢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獨秀的書，就說：「我們既絕對主張用白話體做文章，則自己在新青年裏面做的，便應該漸漸的改用白話。我從這次通信起，以後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話，就和適之先生做嘗試集一樣意思。並且還要請先生，胡適之先生和劉半儂先生都來嘗試嘗試。此外別位在新青年裏撰文的先生和國中贊成做白話文的先生們，若是大家都肯嘗試，那麼必定成功。自古無的，自今以後必定會有。」可以看見玄同提倡白話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話文也頗流行，那時候最著名的白話報，在杭州是林鱗陳敬第等所編，在蕪湖是獨秀與劉光漢等所編，在北京是杭辛齋，彭翼仲等所編，即余與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編的俄事警聞與警鐘，每日有白話文與文言文論說各一篇，但那時候作白話文的緣故，是專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識，並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張以白話代文言，而高揭文學革命的旗幟，這是從新青年時代開始的。

歐洲復興時期以人文主義為標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圖畫而言，中古時代的神象，都是憂鬱枯板與普通人不同，及復興時代，一以生人為模型，例如拉飛兒，所畫聖母，全呈窈窕的幼婦，所畫耶穌，全 是活潑的兒童。使觀者有地上實現天國的感想。不但拉飛兒，同時的畫家沒有不這樣的。進而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謂「人心不同如其面」了。這叫做由神相而轉成人相。我國近代本以文言文為古文，而歐洲人目不通行的語言為死語，劉大白參用他們的語意，譯古文為鬼話；所以反對文言提倡白話的運動，可以說是乘鬼話而取人話了。

歐洲中古時代，以一種變相的拉丁文為通行文字，復興以後，雖以研求羅馬時代的拉丁文與希臘文，為復興古學的工具，而別一方面，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為新文學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亞利奧斯多，樸伽邱，馬基亞弗利等，在英國有綽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蘭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來不認為有文學價值的方言譯述聖經，或撰著詩文，遂產生各國語的新文學。我們的復興，以白話文為文學革命的條件，正與但丁等同一見解。

歐洲的復興，普通分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紀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為盛期，以千五百八

十年至十七世紀末爲晚期。在藝術上，自意大利的喬托，慕伯爾提，文西，米開蘭基羅，拉飛兒，狄奧等以至法國的雷斯古，古容，格魯愛父子等，西班牙的維拉斯開茲等，德國的杜勒，荷爾班一方等，荷蘭與法蘭德爾的凡愛克，魯本茲，朗布蘭，凡帶克等。在文學上，自意大利的但丁，亞利奧斯多，馬基亞弗利，塔蘇等，法國的露沙，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沙，莎凡提等，德國的路德，薩克斯等，英國的雪泥，慕爾，莎士比亞等。人才輩出，歷三百年。我國的復興，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新文學的成績，當然不敢自詡爲成熟。其影響於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現個性的藝術，均尚在進行中。但是吾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各國的百年。所以對於第一個十年先作一總審查，使吾人有以鑑既往而策將來，希望第二個十年與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爾與中國的莎士比亞等應運而生呵！

導言

胡適

一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我們至今還不能有一種整個的敘述。為什麼呢？第一，因為時間太逼近了，我們的記載與論斷都免不了帶着一點主觀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觀的，嚴格的史的記錄。第二，在這短短二十年裏，這個文學運動的各個方面的發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發展的很快，有些方面發展的稍遲；如散文和短篇小說就比長篇小說和戲劇發展的早多了。一個文學運動的歷史的估價，必須包括它的出產品的估價。單有理論的接受，一般影響的普遍，都不夠證實那個文學運動的成功。所以在今日新文學的各方面都還不會有大數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評量的時候，這部歷史是寫不成的。

良友圖書公司的一「新文學大系」的計劃正是要替這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作第一次的史料大結集。這十鉅冊之中，理論的文學要佔兩冊，文學的作品要佔七冊。理論的發生，宣傳，爭執，固然是史料，這七大冊的小說，散文，詩，戲劇，也是同樣重要的史料。文學革命的目的是要用活的語言來創作新中國的新文學，——來創作活的文學，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創作有了一分的成功，即是文學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人們要用你結的果子來評判你。」正如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那個新社會秩序的成敗即是那個政治革命的成敗。文學革命產生出來的新文學不能滿足我們贊成革命者的期望，就如同政治革命不能產生更滿意

的社會秩序一樣，雖有最圓滿的革命理論，都只好算作不兌現的紙幣了。

所以我是最歡迎這一部大結集的。新文學大系的主編者趙家璧先生要我擔任「建設理論集」的編纂，我當然不能推辭。這一集的理論文字，代表民國六年到九年之間（一九一七——一九二〇）的文學革命的理論，大都是從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少年中國，幾個雜誌裏選擇出來的，因為這幾個刊物都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急先鋒，都是它的最早的主要宣傳機關。

這一集所收的文字，分作三組：第一組是一篇序幕，記文學革命在國外怎樣發生的歷史；這雖然是一種史實的記載，其實後來許多革命理論的綱領都可以在這裏看見了。第二組是文學革命最初在國內發難的時候的幾篇重要理論，以及他們所引起的響應和討論。第三組是這個運動的稍後一個時期的一些比較傾向建設方面的理論文章，包括關於新詩，戲劇，小說，散文各個方面的討論。

我現在要寫的序文，當然應該概括的指點出那些理論的中心見解和重要根據。但我想，在那個提要的說明之前，我應該扼要的敘述這個文學運動的歷史的背景。

這個背景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古文在那四五十年中作最後掙扎的一段歷史。（參看我的「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那個時代是桐城派古文的復興時期。從曾國藩到吳汝綸，桐城派古文得着最有力的提倡，得着很大的響應。曾國藩說的「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最可以代表當時文人對這個有勢力的文派的信仰。我們在今日回頭看桐城派古文在當日的勢力之大，傳播之廣，也可以看出一點歷史的意義。桐城派古文的抬頭，就是駢儷文體的衰落。自從韓愈提出「文從字順各識職」的古文標準以後，一些「古文」大家大都朝着「文從字順」的方向努力。只有這條路可以使那已死的古文字勉強應用，所以在這一千年之中，古文越做越通順了，——宋之歐蘇，明之歸有光錢謙益，清之方苞姚鼐，都比唐之韓柳更通順明白了。到曾國藩，這一派的文字可算是到了極盛的時代。他們不高談秦漢，甚至于不遠慕唐宋，竟老老實實的承認桐城古文爲天下之至

美！這不是無意的降格，這是有意的承認古文的倣作越到後來越有進步。所以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的自序說：

姚鼐曾國藩的古文差不多統一了十九世紀晚期的中國散文。散文體做到了明白通順的一條路，它的應用的能力當然比那駢儷文和那模倣殷盤周誥的假古文大多了。這也是一個轉變時代的新需要。這是桐城古文得勢的歷史意義。

在那個社會與政治都受絕大震盪的時期，古文應用的方面當然比任何過去時期更多更廣了。也許古文在那四五年中，有這麼多的用處：第一是時務策論的文章，如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如王韜的報館文章，如鄭觀應，邵作舟，湯壽潛諸家的「危言」，都是古文中的「策士」一派。後起的政論文家，如譚嗣同，如梁啟超，如章士釗，也都是先從桐城古文入手的。第二是翻譯外國的學術著作。最有名的嚴復，就出於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綸的門下。吳汝綸贊美嚴復的天演論，說「其書乃駢駢與晚周諸子相上下」，嚴復自己也說，「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其實嚴復的譯文全是學桐城古文，有時參用佛經譯文的句法；不過他翻譯專門術語，往往極力求古雅，所以外貌頗有古氣。第三是用古文翻譯外國小說。最著名的譯人林紓也出于吳汝綸的門下；其他用古文譯小說的人，也往往是學桐城古文的，或是間接模彷林紓的古文的。

古文經過桐城派的廓清，變成通順明白的文體，所以在那幾十年中，古文家還能勉強掙扎，要想運用那種文體來供給一個驟變的時代的需要。但時代變的太快了，新的事物太多了，新的知識太複雜了，新的思想太廣博了，那種簡單的古文體，無論怎樣變化，終不能應付這個新時代的要求，終于失敗了。失敗最大的是嚴復式的譯書。嚴復自己在羣己權界論的凡例裏曾說：

海內讀吾譯者，往往以不可猝解，嘗其艱深。不知原書之難且實過之。理本奧衍，與不佞文字固無涉

也。

這是他的譯書失敗的鐵證。今日還有學嚴復譯書的人，如章士釗先生，他們的譯書是不會有人讀的了。

其次是林紓式的翻譯小說的失敗。用古文寫的小說，最流行的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聊齋志異有圈點詳註本，故士大夫階級多能閱讀。古文到了桐城一派，敍事記言多不許用典，比聊齋時代的古文乾淨多了。所以林紓譯的小說，沒有註釋典故的必要，然而用古文譯書，不加圈讀，懂得的人就很少。林譯小說都用圈斷句，故能讀者較多。但能讀這種古文小說的人，實在是很少的。林紓的名聲大了，他的小說每部平均能銷幾百本，在當時要算銷行最廣的了，但當時一切書籍（除小學教科書外）的銷路都是絕可憐的小！後來周樹人作人兩先生合譯域外小說集，他們都能直接從外國文字譯書，他們的古文也比林紓更通暢細密，然而他們的書在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這個故事可以使我們明白，用古文譯小說，也是一樣勞而無功的死路，因為能讀古文小說的人實在太少了。至於古文不能翻譯外國近代文學的複雜文句和細緻描寫，這是能讀外國原書的人都知道的，更不用說了。

嚴格說來，譚嗣同梁啟超的議論文已不是桐城派所謂「古文」了。梁啟超自己說他亡命到國外以後，做文章即

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

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這種「新文體」是古文的大解放。靠着圈點和分段的幫助，這種解放的文體居然能做長篇的議論文章了；每遇一個抽象的題目，往往列舉譬喻，或列舉事例，每一譬喻或事例各自成一段，其體勢頗像分段寫的八股文的長比，而不受駢四儻六的拘束，所以氣勢汪洋奔放，而條理淺顯，容易使讀者受感動。在一個感受絕大震盪的過渡社會裏，這種解放的新文體會有很偉大的魔力。但議論的文字不是完全走情感的一條路的。經過了相當時期